

零工经济视域下产业后备军的再思考

美合日班·亚尔麦麦提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1日

摘要

当代产业后备军的形态与运作逻辑转变, 是理解资本积累过程与雇佣关系的核心基础。本文依托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 结合零工经济的发展特征, 重新梳理了当代产业后备军的形态变化, 剖析其运作逻辑的调整方向, 探讨零工经济下产业后备军的当代境遇, 最终探寻实现其解放的可能路径。研究认为, 当代产业后备军正经历从传统失业群体向广泛社会阶层扩散的结构性转型。在零工经济作用的凸显下, 当代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不再仅依靠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波动, 而是同时发生在就业状态内部与家庭再生产领域之中。这一双重隐匿, 也让“后备”从一种固定身份转变为一种持续处境。

关键词

产业后备军, 零工经济, 平台资本, 再生产

Rethinking the Industrial Reserve Army in the Context of the Gig Economy

Meiheriban Yaermaimaiti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ugust 10,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1, 2026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form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 the contemporary industrial reserve army constitutes the core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Drawing on Marx's theory of the industrial reserve army and incorporating the developmental features of the gig economy,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evolving forms of the contemporary industrial reserve army, analyzes the reorientation of its operational logic, explores the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t emerges within the gig economy, and ultimately investigates potential pathways toward its emancipation.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contemporary industrial

文章引用: 美合日班·亚尔麦麦提. 零工经济视域下产业后备军的再思考[J]. 哲学进展, 2026, 15(9): 204-210.

DOI: 10.12677/acpp.2026.159439

reserve army is undergoing a structural transition, expanding from its traditional base among the unemployed to a broader diffusion across diverse social strata. With the growing prominence of the gig economy,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industrial reserve army is no longer determined solely by fluctuations in labor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rather, it takes place simultaneously within the sphere of employment itself and within the domain of family reproduction. This dual process of invisibilization has transformed the notion of “reserve” from a fixed identity into a persistent condition.

Keywords

Industrial Reserve Army, Gig Economy, Platform Capital, Reprodu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产业后备军作为《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核心概念，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更是资本得以持续进行和不断扩张的重要条件，根本职能在于“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1]。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认为，产业后备军主要由失业者构成。然而，依托于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平台的零工经济、平台劳动等新型产业形态，使得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迁，视为一个全球范围内产业后备军重组的过程[2]。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改变，那些工资低于正规工作者的非正规工作者，即大量表面上有工作却始终面临贫困状态的“有工作的穷人”同样处于产业后备军状态。他们随时可能被解雇，没有社会保障，工资仅够维持生存，无法形成稳定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3]。在当代平台资本主导的产业形态中，零工经济借助看似是个人选择或市场规律的表象，吸引大量劳动群体重新进入灵活就业领域，扩充了产业后备军规模，使得原本的“后备”属性逐渐扩散至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从而延续并巩固了资本的制度性基础。因此，深入分析当代平台资本下的零工经济如何重塑人口过剩的具体机制，有助于剖析资本在当代所呈现出的剥削形式。本文拟从数字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与渗透的宏观背景出发，批判性考察隐匿于产业后备军社会地位与功能之中的劳动与资本关系，对零工经济下产业后备军的形态、运作逻辑展开分析，进一步讨论其解放的可能方向。

2. 零工经济重塑产业后备军的形态

马克思在分析以往生产方式与现代工业的技术变革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4]。劳动的不稳定性并非平台经济的偶然特征，而是资本逻辑在现代工业中的必然要求。当代平台资本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让原本清晰的失业 - 就业边界，以及工人的劳动保障水平都变得模糊。

在早期较理想的工业生产组织方式下，劳动者在集中化的生产场所中从事标准化操作，与工厂或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其就业状态具有清晰的可识别性——要么处于在岗状态，要么处于失业状态。然而，随着数字平台经济的兴起，劳动过程的不确定性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特征。“按需 - 适时”(on-demand/just-in-time)工作模式将劳动拆解为离散的、单项的任务单元，劳动者临时受雇于特定目的的单项活动，活动一结束便回到失业状态，等待下一单任务。马克思在论述劳动从属关系时曾指出，早期

的劳动从简单的形式从属，逐步发展为资本通过技术变革与劳动重组，最终实现对劳动过程物质形态本身的重塑。零工经济用工的特点并未偏离这一基本逻辑，其任务化、弹性化的用工特征削弱了传统劳动关系的持续性和从属性[5]。在数字平台当中，从前没有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的、从属于资本的劳动，被重新纳入用工体系，使劳动者建立多重劳资关系。因此，基于劳资从属性强弱，可进一步区分三种依托数字的劳动形式：一是受雇佣数字劳动，即专业数字劳动。它包括软件开发、算法设计等高技能技术劳动者，他们虽然拥有弹性工时和高薪优势，但仍被数字资本剥削其创造的剩余价值；二是自雇式数字劳动，即平台零工劳动，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依托数字平台的灵活、自由就业；三是共享式数字劳动，又称用户无酬劳动，指网民在日常上网活动中无偿为平台生产数据的行为，用户在“玩”的自由中进行劳动生产[6]。在这些数字劳动中，工人将自己视为自我创业者，决定自己的行程，规划自己的报酬，并将竞争逻辑与自我监督内化为个体的行为准则。而实际上，这些期望和感受本身是算法强化意识形态的结果，根本目的在于为资本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

相较于一般的资本积累模式，零工经济也改变了用工关系的法律边界与社会保障的制度框架。在当代世界市场中，全球南方地区的劳动模式正呈现出普遍的非正规性和低工资水平的特点，使无保障工作成为常态[7]。传统雇佣关系从消极层面来说，是资本支配活劳动、实现自身增值的有效手段，但从积极层面来看，这种雇佣关系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因劳动者们不懈地斗争与争取，发展为受到法律明确承认与保护的正式合同，因此具备更为显著的相对稳定性[8]。而在零工经济中，无保障工作使劳动者普遍处于劣势，罗杰斯等学者将其总结为以下四个维度[9]，首先是工作的持续性，通常是指工作合同期限较短或失业风险较高的工作；其次是对工作条件的控制程度。该维度涉及劳动者对其劳动过程的自主权，例如工作环境、劳动强度、休息时间等；再是劳动者受法律制度与福利制度保护的程度；最后是劳动者的收入满足生活需要的程度。他认为收入的无保障性，取决于低收入是否导致劳动者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和社会身份的安全感。在平台经济与零工劳动的扩张中，就工作连续性而言，平台用工的任务化特征使劳动被拆解为离散的单项活动，劳动者无法预期下一单何时到来，也无法规划自身的劳动节奏；就工作条件的控制而言，算法管理取代了直接监督，劳动者虽享有名义上的自由，实则被实时调度与评分系统所支配；就法律保护而言，劳资关系多重化的用工模式使劳动者被排除在劳动合同、工伤保险等基本保障之外。除此之外，数字平台也使得劳动者不再固定于某一具体工厂，在不稳定的生产空间里使劳动者的劳动场景和生活场景难以辨别，加剧资本在不稳定的生产时空场域谋求超额利润。因此，无保障工作成为当代产业后备军以不稳定者形态存在的制度性基础，劳动者即便处于在岗状态，也始终无法摆脱随时被替代的恐惧与生存的不确定性，其作为劳动力的“后备”属性内化于就业状态本身之中。

综上，产业后备军的扩张并非以失业率上升作为唯一表征，还有相当一部分以无保障零工者这种隐蔽的新形态呈现。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产业后备军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的定位与功能，进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调节逻辑。

3. 零工经济改变产业后备军的运作逻辑

当代产业后备军的形态转变并非孤立的现象，其背后意味着某种运作逻辑的重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必然带来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这是一个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规律，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趋势。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对劳动的节约又反过来成为加强剥削劳动者的手段，不仅迫使更多劳动者加入失业后备军的行列，还会通过市场与家庭的相互作用，将这种剥削从市场中处于从属地位扩散到更广泛的劳动者群体当中。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循环过程时，将资本的运动划分为流通($G—W$)、生产($W…P…W'$)、流通($W'—G'$)三个阶段，并指出在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本占据支配地位，流通阶段主要服务于生产阶段的稳

定运行[10]。然而,当工业产品市场趋于饱和、消费需求日趋多元化时,资本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无休止追逐迫使其调整策略,西方发达国家逐步从福特制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转向按需生产的弹性积累体制。在福特制时代,为了维持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稳定运转,资本需要一支规模稳定的在岗劳动者队伍,同时将失业群体作为公开的产业后备军存放在劳动力市场中,通过失业威胁压低在岗工人的议价能力,以此维系稳定的剥削秩序。而零工经济时代,数字平台通过技术手段打破了传统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和时间限制,能够在短时间内调度覆盖全国甚至更广范围的零散劳动力,随时根据资本增殖的需要完成劳动力的征召与释放。于是,资本不再需要将过剩劳动力固定为公开的失业群体,也不需要为维持劳动力的存续支付任何额外成本,只需通过算法动态调整派单价格与任务量,就能自动吸引劳动者进入或退出劳动过程,完成对产业后备军的调度。正是这一运作逻辑的转变,使资本不再需要维持大规模的“失业蓄水池”来施压,而是通过算法调度、即时匹配等方式,将产业后备军的“储备”功能内化于劳动过程本身。从阶层规模来看,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被纳入平台调度的范围,产业后备军也由此从特定的失业群体转变为覆盖整个社会的劳动储备[11]。这种低门槛、大范围的动员方式导致后备军对在岗劳动者的潜在压力转化为直接竞争压力,即每一名零工都需要和成千上万可能承接同一任务的劳动者竞争。为了获取有限的任务机会,劳动者只能主动接受更低的报价、更苛刻的劳动条件,资本得以在不增加固定用工成本的前提下,持续压低劳动报酬,维持自身的剥削优势。对于劳动者而言,其规模的扩张不仅并未带来阶层地位的普遍改善,反而呈现出一种量的膨胀与质的恶化并存的悖论——在兜底社会就业与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社会功能同样具有局限性与脆弱性[12]。从阶层内部结构来看,零工经济催生了阶层构成的多元化与异质化。传统产业工人队伍正在经历从单一产业群体演变为包含传统产业工人、平台零工、知识型劳动者、新文化生产者等多类群体的复合结构[13]。例如,学者根据零工经济下劳动者进入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方式,区分了传统零工经济与新零工经济,认为前者指依托数字平台进行劳动参与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后者则强调临时性、项目性、参与者有特定技能且相对自主的自由职业者,两类零工经济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存在交叉和过渡形态[14]。可见,产业后备军已从马克思时代单一的同质性失业群体,发展为覆盖更广泛以及随时可调用的劳动力储备。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未对家庭内部的无偿再生产劳动与产业后备军形成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展开系统论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深入探讨了家庭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将其视为维系资本主义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该理论流派的学者们着重剖析了资本市场与家庭内部生产关系之间复杂而深刻的相互作用,系统阐释了从“家庭主妇化”现象到广义的再生产劳动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间的内在联系,最终揭示了产业后备军的生成并不仅限于工厂大门之外的市场领域,同样也隐秘而持续地发生于家庭内部[15]。家庭通过无酬的照料、养育和日常维系劳动,默默地完成着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与世代更替,从而为资本主义的持续积累提供了根本性的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上,学者 Munro 对家庭、企业、国家三部门进行梳理分析,提出了一个层层递进的相互依存模型,以揭示三者如何共同维持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16]。该模型指出,家庭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和维持核心劳动力商品的基本单位,通过无偿的家务劳动、养育劳动与照料劳动,完成劳动者的生产与再生产。企业通过支付工资作为回报,但这笔工资通常仅够维持劳动力的基本生存,并未完全补偿家庭的全部付出。同时,家庭还通过教养子女等无偿劳动,为国家产出了接受社会化、遵守纪律的公民。国家则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来支持家庭完成这些再生产任务。企业通过税收支持国家,国家提供基础设施、法律秩序等确保企业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她认为,当代平台经济出现的大量不稳定、无保障工作,加强了家庭成本社会化甚至无偿化的趋势。因此,资本才能够以更低的工资水平雇佣工人,也才能够承受随时解雇工人、将其推回产业后备军队伍的代价。工人的生存底线由家庭的无偿劳动支撑,比如与父母同住、由配偶承担家务与育儿工作等等。

平台资本将各种社会再生产形式不断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零工劳动的组织、交付方式具有高度控制权，这使得资本的市场逻辑并不局限于创造新市场，而更多在于改造旧市场。依托零工形成的不稳定、无保障的劳动条件，从网约车、外卖这类平台核心业务蔓延至摄影、清洁、建筑等其他行业，不断强化资本对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控制，进而扩大了全球资本剥削的基础[17]。于是，一些原本并不属于传统定义的失业群体，在排名、评分、推荐权重等算法机制的作用下，即便正处于劳动过程中，也始终面临着持续的可替代焦虑之中，使得产业后备军不再局限于那些被排斥在劳动过程之外的人群。

4. 零工后备军的当代境遇

零工经济的运作模式依赖于市场与家庭之间的互动，这一双重体系的稳定持续运转，为我们理解和解释当代背景下，日益庞大的产业后备军普遍面临低工资、不稳定就业以及缺乏社会保障的剥削处境等现象提供了思路。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价值时指出，劳动力的价值取决于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在零工经济中，平台所支付的报酬往往低于这一价值标准，即劳动者通过平台获得的收入不足以覆盖其本人及家庭成员的生存、医疗、教育、养老等全部再生产费用。这种剥削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资本并不需要独自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成本，当代平台资本正通过支付这种低于再生产成本的工资进行获利增值[18]。低工资的持续存在，在表面上可以归因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当产业后备军规模庞大时，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自然压低了工资水平。然而，这只解释了低工资的市场机制，并未解释其何以可能的物质条件。真正使低工资得以持续的原因在于，劳动者即便接受低于再生产成本的工资，仍然能够存活并维持基本的劳动能力，因为家庭作为一个无偿的风险吸收器，不断吸收着劳动者在不稳定就业中所承受的生存压力[19]。当一个劳动者的工资不足以支付房租时，他可以与父母同住；当工资不足以支付育儿费用时，他的配偶可以放弃工作承担照料责任；当工资不足以应对疾病或工伤时，家庭成员可以筹集医疗费用。所有这些都是家庭以无偿劳动和情感互助的方式，承担了本应由资本或国家承担的社会再生产成本。因此，低工资的持续并不是市场的自然结果，而是资本对家庭无偿劳动隐秘依赖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早已揭示，资本主义将人口的生产与利润的生产分割为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并将前者的成本与责任指派给特定的劳动力群体，即承担了绝大部分无偿照料、养育与家务劳动的再生产劳动者。这一制度安排不仅限制了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时间投入与地域流动性，更使其成为资本眼中理想的弹性劳动力。他们之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中率先被排斥或集中于不稳定就业，并非由于其个体偏好，而是因为再生产领域内部不平等的劳动分工已经将其置于结构性的不利位置。在平台经济所催生的新劳动形态中，一方面，这一群体不成比例地承担着低技能、低薪酬、非正规的零工工作。这类工作无需通勤且可在零碎时间内完成，表面上为承担照料责任的劳动者提供了便利，但其背后是劳动的高度不可见化、非正规化与去保障化，使劳动者的贡献既不被充分认可，也不受劳动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覆盖。另一方面，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高度可见的劳动形态，即内容创作者以自我呈现、情感表达和互动策略获取关注与流量。这类劳动表面上赋予劳动者以可见性和成功机会，但这一过程伴随着高度的情感劳动投入。劳动者必须营造真实、亲密的氛围，展现私人化的生活场景，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同时规避过度曝光所带来的风险。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的情感表达、身体呈现与亲密关系被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迫使劳动者持续进行情感层面的自我管理 with 自我规训，最终达成平台资本对劳动者意识形态的重塑。

与这些劳动者在家庭与市场之间的双重劳动状态相似，零工经济在最初主要吸纳的是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而随着平台经济不断地加速发展，零工经济正经历从边缘向更广泛社会阶层的转型，使更多零工劳动者处于随时可被调用和抛弃的双重存在之中。

5. 产业后备军的解放条件

针对零工经济下产业后备军呈现出的双重隐匿运作机制，现有对生产或再生产的讨论只展现了资本主义压迫下的部分图景。因此，要探寻并构建一条能够真正超越当下困境的现实出路，解放条件需要被放置在一个同时观照生产与再生产的分析框架中加以审视。

生产领域首先是对劳动法律关系的重新认定与制度性改革。一方面，要确认零工劳动者的雇员身份，通过立法明确平台与零工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将其纳入正规劳动保障体系，保障零工劳动者享有与有保障的正规就业者同等的劳动权益，让平台无法规避自身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义务[20]。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产业后备军的组织化建设，提升劳动者的整体议价能力。平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零工经济将劳动者拆解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极大削弱了劳动者的谈判议价能力，让资本可以轻易利用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压低劳动报酬。同时，这种竞争进一步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逐渐向享有保障的正规无产阶级劳动者与产业后备军之间的竞争转变。二者的劳动境况虽存在差异，却同样处于自身劳动力价值被资本持续压低的处境之中。因此，产业后备军与拥有稳定保障工作的劳动者需要共同开展精神层面的革命，推动全体劳动者都能够参与到劳动标准制定和规则协商的过程中，以防平台资本陷入寡头统治的局面。再生产领域的困境，不仅需要打破资本对家庭无偿再生产劳动的依赖，防止资本主义利用生殖技术将生殖过程转变为新的工业生产过程，还可抓住零工经济兴起的机遇，对既有性别分工结构进行干预。国家、企业和社会需要承担起更多再生产领域的公共责任，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养老、照料类公共服务，建立家务劳动补偿机制，让原本隐匿的无偿劳动得到合理补偿与社会认可。针对当前零工经济中非自然形成的性别分工格局，可积极推动平台破除基于某一性别数据算法形成的对传统性别分工的依赖[21]，鼓励在算法分析中纳入劳动者从生产领域获得的工资，以及在再生产领域的必需开支，进而拓宽弱势群体零工劳动者的劳动议价空间。

零工经济并没有消灭产业后备军，而是通过平台资本将其形态从早期的静态的失业大军逐渐改造为动态的劳动力，并通过算法强化了对这支后备军的控制与剥削。经典马克思主义将产业后备军界定为游离于生产之外的相对过剩人口，而在零工经济的运行中，劳动者常常同时处于两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有工作，却随时可以被替代；有收入，却不足以完成自身的再生产；在岗，却始终无法摆脱“后备”的身份属性。这种状态使我们重新审视“后备”一词，当代产业后备军的核心特征已不再是失业或待业，而是在生产与再生产、有酬与无酬、在岗与后备之间不断被调用、不断被转换的普遍化劳动处境。

参考文献

- [1] 王庆丰, 苗翠翠. “产业后备军”的生命政治[J]. 国外理论动态, 2019(4): 16-25.
- [2] Jonna, R.J. and Foster, J.B. (2016) Marx'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Precariousness: Its Relevance Today. *Monthly Review*, 67, 21-45. https://doi.org/10.14452/mr-067-11-2016-04_1
- [3] (美)阿恩·卡勒伯格, 凯文·赫威森, (韩)申光荣. 有工作的穷人: 全球化与亚洲地区不稳定就业[M]. 张凌, 译.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31.
- [5] 王鹏飞. 平台经济下零工劳动者保护的规范危机与劳动关系认定[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1(6): 103-111.
- [6] 任保平, 逢文佐. 数智经济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拓展研究[J]. 当代经济研究, 2026(4): 24-33.
- [7] 伊德利·科隆比尼, 张若辰. 平台资本主义与产业后备军[J].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2): 143-158.
- [8] 陈英杰. 平台经济下“零工后备军”现存困境及对策分析[J]. 甘肃开放大学学报, 2023, 33(5): 84-88.
- [9] Rodgers, G. and Rodgers, J. (1989) Precarious Jobs in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 The Growth of Atypical Employment in We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 [10] 汪建华. 灵活用工与资本劳动力经营职能的发展——基于弹性积累体制的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25, 40(1): 203-225, 230.
- [11] Bernard, S. (2025) *Uberization and Overexploitation: Racial Platform Capitalism in Paris, London and Montréal*. Palgrave Macmillan.
- [12] 何里程. 灵活就业群体的职业边界及社会功能分析[J]. 人口与社会, 2025, 41(3): 37-45.
- [13] 魏丽. 新经济形态下我国产业工人的发展演变及其实践启示[J].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25, 11(3): 141-150.
- [14] 丁瑜, 梁家恩. 外发工厂妇女的劳动生活困境与应对: 一个零工经济与性别融合的分析[J]. 妇女研究论丛, 2021(6): 32-49.
- [15] 玛丽亚·米斯. 父权制与资本积累: 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女性[M]. 李昕一, 徐明强,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3.
- [16] Munro, K. (2019)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Household Production. *Science & Society*, **83**, 451-468. <https://doi.org/10.1521/siso.2019.83.4.451>
- [17] Pettas, D. (2024) Platform Labour on the Margins and beyond the Digital Realm: Mapping the Landscape of "Platform-Generated Labour" in the Digitally Mediated Short-Term Rental Market. *Digital Geography and Society*, **6**, Article ID: 100082. <https://doi.org/10.1016/j.diggeo.2024.100082>
- [18] 齐昊, 田勋. 平台经济中的“无保障工作”——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J]. 国外理论动态, 2022(4): 139-148.
- [19] Pais, I. and Zanoni, P. (2024) Deepening or Buffering the Crisi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under Capitalism? The Case of Digital Care and Domestic Work Platforms. *Labour & Law Issues*, **10**, 77-105.
- [20] 蒂姆·克里斯蒂安斯, 姜昆. 平台合作主义与零工经济中无支配的自由[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5(2): 168-176.
- [21] 陈龙, 赵磊, 盛禾. 隐匿的她: 女外卖骑手是否遭受算法性别歧视? [J]. 妇女研究论丛, 2025(5): 38-49.